

讲好中国故事 我们在路上

柳茜

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读书时，感觉很多人对中国有着或多或少或多的偏见。我不止一次听到身边的同学说：看看北京和上海，地铁比纽约都好，中国好意思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吗？可是，我也知道，这些偏见的形成大多是因为他们作出判断基于的事实是不完整的，甚至是被扭曲的。我无法改变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认为多元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应当被尊重。但是，我想给他们提供一个真实的中国，好的和不好的方面，以及这背后的原因。

2015年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毕业后，我发起创建了世界青年发展论坛(WYDForum)，一个致力于促进世界各领域优秀青年之间的对话和思维共享的NGO。哈佛中国行 是我们举办的主题项目。

世界青年发展论坛想做的和正在做的事，就是通过一系列中国行的结构化参访，将真实的中国介绍给世界。以哈佛中国行 为例，在行程设计上，我们围绕4个主题展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崛起中的私营企业、崛起中的社会组织、中国人对历史的态度。根据这4个主题，我们安排了一系列交流和参访活动，从政府到企业，从NGO到学校。例如，我们邀请了一位在国外研究了9年政治学的学者与哈佛同学交流，讲解为什么美国式的民主在中国无法实行。这位学者目前在河南一个镇做镇长助理，并在他管辖的10个自然村做基层民主普选研究，所以他的话非常有说服力。

我们希望告诉同学们，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西方奉行的一些真理 在东方土地上不能扎根？的确，我们有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但我们也有9亿农民和庞大的贫困人口。

下面是一些参加了 哈佛中国行 项目的哈佛大学学生的体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认知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的潜在价值。

安德鲁 希尔斯：我了解了很多中国人对政府和经济增长的态度和观点。我来自美国，所以我非常重视个人自由和言论表达。我的感觉是，在中国，人们普遍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更加重视，而这教会了我如何去理解中国的政策和人民。

迈克尔 何：在这次行程中我最大的心得，就是认识到中国政府成功地融入人民生活的一个方面。通过对亿万人的扶贫，以及对未来诸多现实问题（如污染）的大力解决，中国共产党正在成功地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既然如此，他们的政策又为何必须符合我们美国的理想呢？虽然中国政府未来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但是这次旅行让我意识到，我们对中国政府的一些带有倾向性的负面看法可能并不合理。虽然，在美国，这可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观点，但我愿意就此和任何人展开讨论。

巴塞乐 阿卡拉：我对中国最大的体会就是，它是多么的富有前瞻性。改革在各个层面都得到了接受，并以明智的方式步步推进，不断调整，以尽可能地适应更多人。这个国家了不起的土地改革、经济特区建设、金融贸易区推进，都是国家加快发展的步骤和方式。

航李：中国在过去30年间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就，我在这次行程中被深深震撼。值得一提的是，这次 哈佛中国行 通过各种各样的会议，强调了在中国发展的不同主题，这很了不起。我也认识到，未来世界的领导者，包括这次哈佛中国行 中的领导者，将在未来的数十年中面临更大的挑战，有很多事情要做。

托拜厄斯 克莱莫：回想这次旅程，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中国与我们的许多共通之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越来越西化，或是中国应该接受西式民主，而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比西方国家描绘的更具多样性。

安贾莉 塔迦尔：带着开放地看待不

同政府形态的心情，我结束了中国之行，在这之前我没想到自己能有这样的转变。坦率地说，在参加这次旅行之前，我对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和方式是表示怀疑的。但是，在这次旅行中，通过与不同人的交流、互动，我开始看到了不同的方面，比如，中国令人难以置信、印象深刻的扶贫率。我开始明白，并不存在 正确的政府形式。以强大的一致的愿景去推进目标，是中国成功的关键之一，无论你在意识形态层面接受与否。

艾米丽 邵：这次来中国让我得以深入思考诸多问题：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是如何影响这个国家现在的运作的？为什么政界和商界在应对一些问题时会按照特定的模式行事？我非常高兴能够听到中国的观点，因为在美国，我们只能



参与 哈佛中国行 的代表在学习中餐制作。



参与 哈佛中国行 的代表在体验中国剑术。

接触到西方的观点。同时，能看到中国如何驱动和鼓励每个人，这也让我深受激励。虽然未来有挑战（每个国家都面临挑战），但我对中国的未来感到非常兴奋，并且希望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参与它的经济发展。

安娜 布莱金斯卡娅：中国是一个拥有了不起的成长故事的国家，这里有一些令人非常钦佩的企业，比如阿里巴巴等，它们正在用企业作为平台，去改善成百上千万人的生活，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我期待看到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同时，可持续发展是中国企业发展的核心需要，我希望在未来的几年里，在中国看到更多的利好政策和发展进步。

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偏见和误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

很多阻力和困难，吃了很多亏。

哈佛中国行 的团员在哈佛大学进行选拔，选拔条件很严格，每年的录取率只有12%左右。我不敢说这些人未来是各个国家的总统、总理，但至少是各行业的领军人物。我希望这群可能影响未来世界各国政策的青年在事业的早期，对中国有客观而立体的认识，减少对中国的偏见。20年后，他们就可以影响决策。同时，这批青年领袖在青年中很有影响力，他们就像一粒粒种子，可以把他们对中国理解和认识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为中国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本文作者是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创始人、主席，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硕士毕业生。



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和 哈佛中国行

世界青年发展论坛是由哈佛大学校友发起，哈佛大学教授指导，哈佛、耶鲁、斯坦福、牛津、剑桥等学校校友参与的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论坛聚焦中国，总部设在北京。世界青年发展论坛致力于促进世界青年的发展和成长，增进世界各领域优秀青年领袖之间的沟通和对话，促进青年在国际发展中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作用。

哈佛中国行 项目每年在哈佛大学商学院、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文理学院、医学院和本科学院，筛选27~30名各领域非中国籍的青年领袖，在哈佛大学教授的带领下，到中国进行结构化的主题参访，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不同纬度全面解读中国。项目录取竞争激烈，2016年的录取率仅为12%。在主题和行程设计中，哈佛中国行 力求把握中国发展的逻辑和大势，尽可能涵盖中国的关键问题，将真实的中国介绍给世界。

摘自《青年参考》4月19日 08版

我的 哈佛中国行 印象

Danny Gal

我以为会看到一个封闭的中国,但事实截然相反

我们 哈佛中国行 的最后一夜，是在北京一幢豪华写字楼65层的酒吧中度过的。这里的一切都曾相识，乐队演奏的爵士音乐，杯中的鸡尾酒，以及营造出的氛围，都让人恍惚认为是纽约。但是，这只是坐落在高空的中国。在离这里上百米的地面上的那个中国，和我之前想象的截然不同。

中国正处在转型期，从一切禁止的帝国 转向 充满无限机会的国度。从东到西，从沿海到内陆，没有什么被落下，一切都在飞速移动和变化着，恰似北京高峰期最繁忙街道上无尽的车流。

许多时候，你需要用口罩来保护自己不受空气污染的伤害。中国变化得太快，雾霾是这变化的一个副产品。中国政府决定给经济降温，把经济增速从10%调整为7%。他们担心官僚体系的改革速度跟不上如此快的社会发展速度。我的中国朋友韩先生这么告诉我。中国官员们普遍认为，如果想让这个国家持续增长，官僚体系自身也需要不断改变。政府应当更小（限制行政权力），更开放，也更透明。

这次的中国之行，是我第一次到中国访问。我以为我会看到一个封闭的中国，在那里，人们甚至不敢怀有梦想。但事实截然相反。我看到的是一个开放的国度，有远大梦想的青年一代，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以及优秀的高等教育。这里，历史和现代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同时，历史的印记在人们的决策中显露无遗。

比如，阿里巴巴的市值现在比亚马逊和易趣的市值总和还要高；中国占据全球移动电话市场85%的份额；海信、华为和其他中国二线品牌即将

统治这个世界。在这个古老的国度被侵略和统治许多年后，中国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但中国人没有忘记日本的侵略和占领。当听到日本人或其他人说日本是 进入 而不是 侵略 中国时，他们往往会表现出强烈的愤慨和不满。他们愿意谈论和平崛起，他们给你的整体印象是，中国会尽量避免国际和政治冲突，因为这会阻碍经济的持续发展，至少对生意是不好的。没有一个国家是被贸易摧毁的，接见我们的一位高级别官员说，我们希望和所有的邻居实现双赢。

想实现共同富裕,中国还有一场长征要走

中国很有竞争力，并且是业绩导向的。他们制定了自己的货币政策，使得出口、创建自由贸易区、吸引外商到中国投资，以及中国对外投资更容易。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对外投资的额度将大于外资在中国的投资额度。他们大踏步地前进，势不可当。

在杭州市，我们会见了浙江大学的学生。我问他们是否想成为富翁。答案首先是毋庸置疑的，是，当然之后他们也表达了对社会和青年社会责任的关注。但是，这已经表明他们这一代已经跨越了一道门槛，中国梦是成为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这样的人，而不是像过去一样，成为政府官员。

想实现共同富裕，中国还有一场长征要走。在一次中国扶贫经验研讨会中，包商银行为我们介绍了其作为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工作的一些经验，中国的扶贫工作是全社会参与的项目。什么时候能梦想成真，答案仍在酝酿中。

许多时候，中国与世界竞争的方式是复制别人的想法，然后根据中国当地的情况进行调整和消化，然后创造更好的想法，并成为先行者和领导者。这在很多行业真实地发生着。但是，从宏观的角度说，中国如果要为世界发展创造一种新模式、提供另一种选择，仍然是任重道远。中国正在寻找正确的发展模式，这正

是放缓经济增长步伐的初衷。他们希望控制在加速的空气污染和环境伤害；他们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方法让财富平均地分配到社会各阶层；他们希望通过对政府的改革，最大程度地激发中国人力资源的潜力。

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如何平衡秩序和创造，或者说管制和创新。他们的办法是通过试点和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有时候，政府官员对一些新出现的事物睁只眼闭只眼，他们不想在新事务成熟之前就将其扼杀在摇篮中。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默许了阿里巴巴的成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行业的监管和控制，留出空间让马云们进行创新尝试。

廉价劳动力已经不再是中国的比较优势。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中国整体的劳动力价格在上升。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向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转移。中国需要创新。中国政府现在愿意付钱购买任何关于创新的想法。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同时，创造有利于创新的土壤。除了不断试错，对这个问题，没有人有现成的答案。他们进行了很多讨论，甚至为了对抗老龄化而修改了独生子女政策。

在中国的行程中，我们拜访了很多官方代表。他们中的许多人提到了中国近代历史，在那段历史中，中国反复地被外国侵略者入侵。他们现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失败的反思。失败对他们而言不是需要隐藏的东西，他们将失败变为突破口或转折点。这也是创新的关键。



参与 哈佛中国行 的代表在体验中国茶道。



参与 哈佛中国行 的代表在讨论。

西式民主不会是中国的选择,中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路

西式民主不会是中国的选择，中国正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路。中国政府明白人民需要多少权力，也明白如果不继续推进民主化，中国将无法完成 全面脱贫 这个历史使命。但是，这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不会允许任何人强迫其接受西方社会给定的解决方案，他们必须自己找到答案。现在，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统治了13亿人。在如此大的规模上建立一个民主社会，没有先例，中国正在创造这样一个例子。

我的朋友韩先生跟我谈到过，他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观察和思考。谈到 尽管村民并不完全理解选举的意义，但是仍然愿意去投票，并参与到这样一个民主节日中 时，他的脸上挂着微笑。在中国，有不少像韩先生这样的人，在进行自然村层面的民主实践和研究，政府不仅不干预，反而期待着进一步的结果和人们的反馈。

中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每个会见我们的领导都会这么强调。这个信息包含着几层意思：尽管有着迅速发展，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然很低；这意味着，他们仍旧需要照顾数千万每天生活在2美元贫困线之下的人；这意味着，他们希望世界理解中国在国际贸易标准和一些贸易纠纷中的立场和行为。

随着中国获得越来越多的经济权力，中国人正把目光更多地放在如何成为先行者和行业领导者上。

我相信中国会替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们要问的是，通过何种途径，以及 这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世界只有一个世界领袖，还是中国和美国会找到一个方式，共同领导并造福世界？阿里巴巴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商业模式：让阿里巴巴的所有合作伙伴变得更强大。阿里巴巴的领导者们明白，只有他们的伙伴赢了，他们才会赢。这可以成为世界秩序的新模式吗？

作为从哈佛大学来的访问团，我们在此次中国之行的几乎所有地方都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几乎各阶层的中国朋友都对美国的品牌、文化，以及科技领域的成就怀有欣赏。哈佛大学对他们而言，代表着美国最先进的那一面。他们毫不羞涩地表达了他们的赞美，就像一个男孩儿崇拜地看着兄长，但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长得比兄长更强壮了。这个男孩儿已经成长为一个巨人。好消息是，他仍崇拜他的兄长。他们可以很好地相处吗？时间会证明一切。

本文作者为以色列非营利组织Kav Mashve执行总裁，社会孵化支持机构Impact Hub创始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硕士，2016年随哈佛中国行 参访中国。

摘自《青年参考》4月19日 09版

我看常春藤名校的同龄人

于凡

据美国《世界日报》近日报道，美国常春藤名校的录取竞争日益激烈。美国联邦政府统计数字显示，从2004年至今，这些藤校的录取名额平均增长了5%，申请人数却增长了88%。能进入藤校者，可谓精英中的精英。

这让我想到了3年前，我曾与一群来自藤校的学生领袖有过交流。

2013年夏，全国青联邀请美国常春藤联盟的大学生代表访华，我作为中方志愿者，全程陪同这20余位藤校才俊。

当我们从首都机场接到这群 天之骄

子，他们的表现就和我预料的一样，充满了各种各样的 美国式 做派。无论是在前往市区的大巴车内，还是在任何建筑物内，他们大声聊天的声音几乎可以将楼顶掀翻；经过了一天的紧张交流活动，他们依然有能量晚上继续出去玩。

到北京的第二天他们就问我：北京哪里可以找到酒吧？一些代表表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这辈子还没去过酒吧，所以 现在非常兴奋，想去看看酒吧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实在让我吃惊，印象中美国文化总是和酒与酒吧相联系的。《宿醉》《杯酒人生》等美国电影在向我们展示这个国家与

酒的深刻关联。看到我一脸疑惑，他们向我解释说：这是法律规定的。他们说，美国有明确的联邦法律，各州的年轻人，进入酒吧的最低年龄是21岁，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达不到这个年龄，所以没有去过。他们早就得知在中国年满18岁就可以进酒吧，所以跃跃欲试，想去一探究竟。

在随后几天的相处当中，我发现了中美大学生的更多差异。

在和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会主席的交流中，我得知他主修的专业是政治学和电脑信息技术。当然，在大学生中修双学位在中国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政治学的学生通

常会学习语言学、哲学、法学或经济学等相关领域的专业作为自己的第二专业。令我惊奇的是，这位同龄的美国大学生居然选择如此不同的两个专业。我故意让自己的两个专业差别大一些，这样可以让我接触到不同的知识。他这样解释自己的选择。

中国人注重联系，选择两个相关专业目的是促进更加深入的学习；美国人注重分类，选择两个完全不相关的专业是为了扩展学习的范围。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并不存在谁对谁错、谁高谁低，但这种差异确实存在，我们对这种差异的认识远远不够。理解这种差异让我们懂得了

他们是谁 和 我们是谁。

几天的相处让我体会到，互联网时代让他们对中国有了一定的认识，但这种认识还很肤浅。比如，他们了解中国很多的文化符号，却不理解这种文化符号背后的文化内涵。无论是长城还是故宫，出生在网络时代的美国青年都十分熟悉。很多美国学生在参观故宫时和我提到，故宫的布置十分像张艺谋拍摄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场景，有些学生还能轻声哼出片尾曲《菊花台》的曲调。但对故宫体现出的中国古社会的伦理、制度意义，他们知之甚少。

他们知道中餐、京剧、杂技等具有中

国特色的文化符号，但这些文化符号到底代表着什么？背后体现出中国与美国哪些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这是他们从未思考过的。

如果美国最优秀的一群大学生对中国的理解也不过如此，那么可想而知，我们的文化走出去 任重道远。虽然互联网大大降低了不同国家人们交流的成本，但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那些简单的脸谱化的 异国形象，是最容易被接受和传播的。

作者为外交学院外交学系研究生

摘自《青年参考》2月15日 08版